

「歷史意識與歷史教育」 專號導言

湯志傑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大概是史學界最常引用的一句口號，與柯林烏主張的「所有的歷史都是思想史」，可謂相互映輝。然而，克羅齊會說「所有真的歷史都是當代史」，卻非基於「心靈重演」的緣故，而是因為他認為，過去的事實只會應答現在的，而不會回答過去的旨趣。任何值得歷史之名的書寫，都是由對現在生活的關心所引發或觸動。事實上，隨著視域的擴大或改變，或是價值與興趣的轉變，當代人很自然便會對過去做不同的提問，從而重寫歷史是一直不斷在發生的事。

既然歷史一再改寫，歷史意識理當也會隨之而變才對。但作為百年大計、講求穩定的歷史教育應否也不斷調整呢？單就《思與言》來說，1982年賴澤涵便曾編過「歷史研究與歷史教育」的專號，如今就有重新檢討此一議題的必要嗎？

當然有！當身為中學學習主體的年輕學子史無前例地於2015年衝進教育部，發表自己對歷史教育的看法，反對所謂的課綱微調，並蔚為運動，引發社會對相關議題前所未有的關注，清楚顯示現實的發展要求我們對此進行深刻的反省。《思與言》因此以「歷史意識與歷史教育」為題，向各方公開徵稿。經一年多的努力，我們有幸終能推出由6篇文章構成的專號與大家共享。

關於「歷史意識」，一個最簡單而直接的理解或界定，便是「對歷史的認識」。首先，這自然涉及到實質內容的問題，亦即徵稿啟事裡所揭櫫的，處於當前的現況，臺灣應如何理解臺灣、中國與世界的歷史才較適當的問題。然而，談到歷史意識，必定同時也會牽扯到「如何形成對歷史的認識」此一後設層次，或說認知歷史的基模或圖式為何的問題。當我們如此理解歷史意識後，所謂的歷史教育相應地不會限於正式的學校教育體系，而是舉凡親友閒聊、小說、餐飲、廣告……等，都有可能影響到一個人歷史意識的形塑，都可能是值得探究的議題。

本刊今年初 56 卷 1 期刊登劉龍心教授所寫的文章〈從文化復興到文化重塑：戰後臺灣高級中學「中國文化史」書寫的轉折與蛻變〉，便聚焦於學校教育這個可謂傳遞及形塑一般人歷史意識最重要的機制。透過仔細梳理戰後高中「中國文化史」教科書的轉變，該文為我們揭示了，「中國文化史」如何在學術研究與教育的互饋，以及社會現實發展的影響下，從原本以復興傳統中華文化為宗旨的民族精神教育，慢慢發展到解嚴後漸以根植臺灣、重塑文化認同為目標，並逐漸走向對歷史思維能力的強調。換言之，一旦拉長觀察的時間軸線，就是生性「保守」的學校教育體系也會顯現出因著時代變化而來的調整或改變。

本專號第一篇李衣雲教授的文章，考察的恰恰是相對於學校制式教育的大眾文化，探究臺灣戰後漫畫的內容呈現出何樣的歷史認識。如作者點出的，學校歷史教育的內容即便無法誘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但在國家的正當性暴力支撐下，它還是提供了一套個體認識歷史的大敘事，常成為難以取代的認識歷史時間的參考架構。漫畫雖有更多的視覺取向，更有助於形成身體化的歷史認識，但在戰後初期的時空環境下，常架托在空虛的歷史符號上，缺乏反映現實豐

富細節的臺灣漫畫，畢竟不足以動搖官方的正統歷史意識，充其量構成一虛構的逃逸空間。然而，同處於臺灣這個生活場域的經驗無疑有助於共享相近的社會認識架構與身體實踐記憶，晚近的發展似亦開始透露出，大眾文化在推動讀者對歷史認識的能動性上大有可為之處。參照日本的經驗，讓歷史（材料）變成流行文化的積極元素，不只有助於文創與商機的開拓，無疑也將帶動歷史多元解讀的可能，乃至影響未來世代認識歷史的方式。

儘管民主化以來，以臺灣為認識世界的座標中心仍未能完全確立，但不論是社會現實的發展，抑或教育系統的革新，都慢慢讓過去不符現實的中國中心的認識方式趨於衰頹。如果歷史教育的目的不在養成偏狹的國族意識，而在於培養具有歷史思維能力的健全公民，那麼如何利用 12 年國教的契機，在教育現場落實其課程綱要總綱宣示的理想，解決可能遇到的困難，便是急迫的現實問題。身為高中一線教育工作者的莊德仁老師，正好為我們回答這個問題。

此次徵稿社會科學方面的來稿甚少，以致不論對歷史教育，還是對反課綱微調運動，本專號都欠缺社會科學式的實際田野觀察與分析。還好莊博士以其親身經驗為基礎，觸及了編寫教材、考試引導教學、跨學科架構的影響、探究式教學法……等實際的問題，多少彌補了這方面的遺憾。希望本專號的出刊，有助於扭轉「歷史」與社會科學無關或不重要的刻板印象或錯誤認知。就如第二篇文章所顯示的，對於歷史意識形塑的分析，社會科學的探討無疑可有相當貢獻。

劉教授的論文已指出歷史思維能力的重要，莊老師這篇論文則進一步告訴我們，惟有落實到實際的行為表現來衡量，才能真正培養出所期待的歷史思維的「核心能力」。12 年國教變革帶來的一個關鍵契機是，它明確地引入了態度與價值的項目，設法建立歷史與

我們當前生活的關連，讓歷史不再只是研究已發生的確定過去，不再是學者專有的思維方式，而是大家都可透過學習獲得的，可引導我們迎向未來的思想資源。至於如何把歷史課從被動認識過去的事實轉變成可積極運用的思考資源，關鍵在「閱讀」，特別是「如何」閱讀。莊博士因此詳細介紹、探討了「像史家一般閱讀」與「以文本為基礎的課程」兩種教學模式。

緊接著第三篇林慈淑教授的文章，同樣聚焦於「閱讀」的主題。她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在不夾帶晦澀難解的術語的情況下，為我們仔細梳理了從語言學轉向以來，相關學術脈絡的發展與演變，尤其是對文本概念的逐層釐清，不但提供了以文本閱讀為中心的歷史教育為何興起的重要理解背景，更增進了我們對環繞著文本解讀而來的學術與教育問題的認識。同時，林教授深入分析了「追查史源」與「脈絡化」這兩種閱讀策略的助益與限制，剖析其實際操作的可能性與可能遭遇到的困難，並提醒我們歷史的探問雖多因當前的關切而發，但切莫落入「現在主義」的陷阱。

這同時也就提醒我們，有必要從對實際教學法的反省，再挖深一層，討論較後設也較抽象的認識歷史的基模的問題。第四篇洪銘國博士的文章，便是介紹余琛（Jörn Rüsen）的歷史意識理論，探討了他所謂傳統型、範例型、批判型與演化型四類歷史意識的異同，讓我們清楚看到，歷史意識與價值和道德觀緊密相關，依不同的基模認識歷史，對同一史實會有不同的評判，乃至可得出差異極大的反省。更重要的是，洪博士分析了余琛的說法與臺灣譯介所出現的落差。儘管該文未能對此落差進行脈絡化的分析與探討而略顯可惜，但該文清楚地揭示了，既有的思維慣性會如何影響我們對歷史的認識，以致推演出有違原作者立場的詮釋。該文並因此基於反課綱微調運動所彰顯出的批判精神，高度評價該運動的教育意義，

強調惟有培養包容、接納弱勢者歷史論述的道德素養，才能促成具反身性的多元歷史認識。

除上述 4 篇正式研究論文外，本專號有幸另外邀到由戴麗娟與蔣竹山兩位教授所撰寫的研究紀要。在學界習於只看重發表績效指標的今日，兩人仍願拔刀相助的義舉尤令編者感佩。戴教授言簡意賅地為我們介紹了法國歷史教育一百多年的歷史，足見其功力。該文討論到的史地分不分科、對話性主講的教學法、師資培訓、評量學習成效的方式、打破線性歷史觀的實驗、歷史的公共使用、記憶政治……等諸多議題，在在值得我們思考。畢竟，要檢討、反省歷史教育，他人走過的經驗，既是最寶貴的教材，也是最可借鑑的依據。若僅因文章形式上近於整理、介紹而不認可有原創的貢獻，顯然窄化了對學術貢獻的理解。

蔣教授的文章同樣觸及一個與學界現況顯得略有扞格的現實趨勢，亦即出版市場上明顯出現一波全球史熱，可是在地學界對此卻似少有回應，乃至有意無意間顯得有些忽略。蔣教授從長時段的回歸與公眾史學兩個視角切入，試圖釐清支撐此一書市熱潮背後的力量為何，同時也就觸及了，當我們不再為了成績學歷史時，究竟是為了什麼的問題。如果人人都需透過歷史來定位自己，而今日又無人可再壟斷關於過去的意義生產，人人都可成為史家的話，這除了帶來空前的解放效果，似乎也有回歸學歷史的「本質」的意涵。

這基本上是個值得歡迎的發展趨勢，但學歷史、用歷史跟用歷史的方式思考畢竟還是兩件事。就如戴教授前一篇文章指出的，歷史的公共使用極易引發各種爭議，專業史學與公眾史學的關係無疑仍有待我們繼續思考與釐清。像在對岸的中國，全球史的風潮也吹進了歷史小說的文類裡，並帶來熱銷。這些小說常在穿越小說的架構下，重新講述中國榮光的故事。於是，我們不但讀到明朝經略了

東北，還刺殺了帖木兒；不但下西洋，還遠航到歐洲（見《錦衣夜行》）。隨著中國政府日益不屑於掩飾其帝國主義的心態與行徑，這樣的歷史「改寫」會對一般民眾的歷史意識造成何種影響，乃至促成何種行動的潛能，無疑值得臺灣乃至全世界民眾的關注。